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庾信研究

吉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庾信研究

吉定 著



枯樹賦
庾仲文風流儒雅每內知名
昔將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念
不樂願在槐而歎曰此樹婆娑
竟盡矣至如白蘋蘋水青牛
梓根柱盤魄山雪涯藁裏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庾信研究 / 吉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7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4881 - 1

I. 庾... II. 吉... III. 庾信(513~581)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148号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南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庾信研究

吉定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500

ISBN 978 - 7 - 5325 - 4881 - 1

I·1991 定价: 28.00元

庚子山集序

北周滕王宇文道撰

吳江吳兆宜顯令註

蓋聞五聲應調則宮徵成其文

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聲配五行之

行之

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尚書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

詩疏國風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

門用之鄉黨用之

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

詩疏小雅

邦國而化天下

所陳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

復有陽春白雪之唱

郢中之曲彌高

襄陽者舊傳宋玉對楚王曰歌陽春白雲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

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

秋風黃

一

庾開府哀江南賦註



崑山徐樹穀藝初
炯章仲纂輯

哀江南賦

并序○梁都建康在大江之南哀江南者哀梁亡也○吳氏曰宋玉招魂魂兮歸來矣

庾信

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初仕梁後入西魏仕周並詳賦註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

以上敘國事○王氏曰梁書武帝紀太清三年冬十月也西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按太清三年歲在戊辰建亥之月餘詳賦註粵發語辭○吳氏曰後漢書光武皇帝建武中移國○王氏曰揚州刺史魯恭之

清康熙冠山堂藏板《哀江南賦注》

庚子山集卷一

北周新野庾信著

明東海屠隆評

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我大周之創業也。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雲紀御官。鳥司從職。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

枯樹賦
殷仲文風流儒雅每內知名代
異時移出為東陽太守常念
不樂願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
竟盡矣色如白麻頭如青牛文
梓根柱盤魄山石涯表裏杜
野事

褚遂良書庾信《枯樹賦》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曹 旭

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六朝,是诗性文化的象征。

六朝,如异色的花,以建康为中心的蕊,绽放出东吴、东晋,然后宋、齐、梁、陈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开了四百年到隋唐。

所以,有人就以“六朝”指代“魏晋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时间概念;本《丛书》所称“六朝”,即为其例。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四百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

我想重绘六朝的历史地图,浏览文学金粉剥落的壁画。参加曹氏父子的公宴,让所有充满个性的魏晋人物走出《世说新语》;在筑了又圯、圯了又筑的建康城墙下驰马。

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

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

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

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

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

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坦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吾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着,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都朦朦胧胧地隔着距离:文、笔、札和文学隔

着距离,情、事、意和语言隔着距离,声调和诗律隔着距离,玄言清谈和审美隔着距离,人体美学和诗学隔着距离。正因为有这些距离,文学才变得陌生,变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诗歌探险的小路上,布满歪歪斜斜的脚印,不确定的因素,有时会往后退。在前面举火把的人每每会问:

现在的诗歌,是言志,还是缘情?是感物,还是体道?现在的风气,是人物品评,还是诗歌品评?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

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

从文学的内部看,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情”和不同的美学因子结合,演变出不同的文学特征。

先秦两汉是“情”和“志”的结合,成为“情志”,或称“志”,所谓“诗言志”。六朝是“情”与“性”结合,所谓“吟咏性情”。唐代是“情”与“景”结合,唐诗最大的好处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与“理”结合,因为“情理”而有宋调。至元、明、清,“情”与“趣”结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为,“情”和“性”,是人生里最本质的东西。

时代发展,文学相衔:六朝播种,唐代收获。

从李白那么深情地赞美谢朓,赞美鲍照,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关系。唐宋许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对六朝既定生活的继承;在唐宋诗词里被虚拟化典故,不少都是两晋人真实的故事。唐朝人刘禹锡

4·庾信研究

说：“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隔着时间，六朝人的真实生活，被虚拟成唐朝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的理性与两晋异中有同，苏东坡的才无施不可和知识分子气，喜欢居有竹，都受东晋王子猷的影响。如写精神不可一日无寄托，夜间找朋友晤谈，苏东坡言简意赅的《记承天寺夜游》，让人有点破生活的震撼；而出了四个成语的《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则形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逸品。

在两篇类似的小品里，苏东坡是“随缘”，王子猷是“任诞”。如果说，宋人的“随缘”，是情的“内敛”，那么，六朝的“任诞”，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与六百年前的两晋遥遥相接。

在中国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晋与战国、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学、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都在这些时代得到涅槃。文学的火凤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仑美奂。

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受，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

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他们为文学研究拓疆开域,引领向上的一路,树立楷模而与日月共辉。但是,“二重证据法”也好,“诗史互证法”也好,还都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后目的。

在“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法”以后,把文学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虽然文学研究都要用生命去体验、领悟和感觉,以心传心,但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体悟和感觉。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于是,想编一本刊物叫《六朝》。

刊物没有编成,却编成了《六朝文学研究丛书》。用的正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体悟,这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我的学生。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

我和学生一起读书。每年秋高气爽的九月,我们的学术团队里就会多几个“素心人”,于是,奇文共赏,异义相析,日夕探讨,如切如磋,生活成了诗意的栖息。

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我有许多想做的题目,没有时间做,他们做了;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解决了。

现在,博士忽成行,俨然敬师执。这令我感到快乐,并使我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六朝文学研究风云际会,国际、国内有很多卓有建树的大方之家。而本《丛书》的作者,则是俊彦之士,后来之秀,是渴望驱驰,渴望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六朝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望路争驱、风靡云蒸的局面。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感谢赵昌平、王兴康先生,特别是具体负责的高克勤、曹明纲先生,为这些年轻的新锐,提供了驰骋的平川。

相信,《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都有六朝特色——人和文学“初恋”的悸动——一种六朝文学风流的“初体验”。

2005年5月于上海樱园梦雨轩

序

曹 旭

—

庾信是南北朝结束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和诗人，是一个南北文化、南北文学、南北诗学的使者、交融家和集大成的人。

在庾信之前，南北诗歌像两条河流。南水柔橹清歌，北水陇头幽咽；南朝诗歌绮丽，词采、思绪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北朝则山川般地质朴、大漠般地原始，各呈风貌，各走道路，而庾信则是一条横跨南北的港湾，拦住它们的去路；南水北水，都在庾信的诗里合流。

说不清庾信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庾信“失去了”，又“得到了”；“得到了”，又“失去了”。这使庾信诗歌变得沉重，家国之难、身世之悲、南朝时积累的诗歌艺术技巧、北朝产生的失路之感、羁臣之恨、乡关之思，赋予庾信诗歌兼具南北的风格，既有南朝诗歌的绮丽清新，又有北朝诗歌壮气爱奇的俊逸；即既具阴柔的美学，又兼阳刚的美学。

自东晋以来，阴柔和阳刚美学各自发展的情况，至庾信结束；东晋以来，南北诗歌分流的情况，至庾信结束；东晋以来，南北诗歌风格不兼容的情况，至庾信结束。

庾信，是一个高高地坐在南北文化交流和向隋唐诗歌演

进坐标上的重要诗人,是律绝诗、律赋、四六文的定型者。文学史有了庾信,加上徐陵、薛道衡等人伴随,登城远望,唐诗就是不远处的一片江山。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老杜是充分认识到庾信的文学成就和风格意义的人。

二

作为一个收束六朝,开启唐代诗学的重要诗人。对庾信的研究,从庾信同时代就开始了,一千四百多年,毁誉不一,常研常新,这就是庾信文学的魅力所在。

近几十年来,庾信更成了研究的热点。一批研究者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对作者的生平、仕历、作品年代、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集注、选本、考证、批评、论说、创作等方面。

研究者如李详、陈寅恪、高步瀛、饶宗颐、曹道衡、刘文忠、许逸民、鲁同群、葛晓音、钟优民等先生,都有研究论文或笺注。

近20年来,研究庾信的论文有160篇。与庾信研究相关的学术专著、文学史著作有几十部。如刘文忠的《鲍照与庾信》、钟优民的《望乡诗人庾信》、鲁同群的《庾信传论》、张翥、曹盟的《历史的庾信与庾信的文学》、林怡的《庾信研究》等。此外有谭正璧、纪馥华的《庾信诗赋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舒宝璋的《庾信选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许逸民的《庾信诗文选译》等。

其中,许逸民点校的《庾子山集注》堪称精品;而鲁同群

的《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刘文忠的《庾信前期作品考辩》，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史》第十九辑和第二十七辑，为庾信研究提供了足资依据的基础，推动了庾信研究的深化。

与大陆学者一样，台湾学者对庾信研究也充满了关注，成果颇丰。据洪顺隆教授主编的《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兴膳宏著有《望乡诗人——庾信》（谭继山译，台北万象出版有限公司 1984 年），矢嶋美都子出版过《庾信研究》。韩国学者李国熙著《庾信后期文学中乡关之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西方学者对庾信也有一些研究。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葛克成（William T. Granham, jr）就研究过《哀江南赋》并将其译成英文。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成果中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乡关之思的问题、前后期作品的写作年代考辩、庾信的心态、创作主题、作品艺术性等问题。

80 年代以后，以庾信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十几篇，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4 年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许东海的硕士论文《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徐宝余的《庾信研究》，就是他在北大跟随袁行霈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庾信处于南北朝时期的复杂性，还有一些关于庾信生平、创作、交游、在文学史的地位、影响等研究，都还存有一些不足。

三

吉定学弟敏而好学，敏而好奇，文字好，基本功扎实，进校

前,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两篇关于庾信的论文,引起了同仁的关注与好评。进校以后,决定以庾信研究为题,并在《民族文学研究》上又发表一篇相关论文。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吉定学弟对庾信及其作品没有做全面论述,学界已有定论的问题尽量不论,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已言之,我即不言;人未言及,我则论述。作者力求自己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即运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力求解决有关庾信的基本问题。

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吉定学弟三年的努力,完成了《庾信研究》,又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学术专著《庾信研究》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四

我以为本书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第一是对庾信生平仕历的研究。特别是对前人未多涉猎的庾信家世、与梁帝王关系、出使东魏、侯景之乱等问题,作了深层的探究;对庾信入北后的仕历,作了梳理,其中对庾信由西魏入北周的前期八年生活的研究,在学术上有明显突破。其论述的主要依据,不仅是历史文献,还有庾信及其同时代作家作品中的材料,联系当时北周政治、外交、文化策略和活动,综合文学创作等情况,外证、内证相结合,得出中肯的结论。

第二是对庾信文学主题的研究。其创新意义在于,作者不囿于传统单一的乡关之思说,而是提出了乡关之思、隐